

与改革开放同行

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（第一辑）

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/ 编写



与改革开放同行

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（第一辑）

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/ 编写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与改革开放同行：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·第一辑 / 中国人民大学校友
工作办公室编写. —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9.5

ISBN 978-7-300-26810-1

I. ①与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中国人民大学—校史 IV. ①G649.2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45618号

与改革开放同行

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(第一辑)

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编写

Yu Gaige Kaifang Tongxing——Zhongguo Renmin Daxue Xiaoyou Koushushi
(Di-yi Ji)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010-62511242(总编室)	010-62511770	(质管部)
	010-82501766(邮购部)	010-62514148	(门市部)
	010-62515195(发行公司)	010-62515275	(盗版举报)
网 址	http://www.crup.com.cn		
	http://www.1kao.com.cn (中国1考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		
规 格	170mm×240mm 16开本	版 次	2019年5月第1版
印 张	32.25	印 次	2019年5月第1次印刷
字 数	436 000	定 价	7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与改革
开放同行

晓华题



编 委 会

编委会主任 靳 诺 刘 伟

编委会委员 靳 诺 刘 伟 张建明 贺耀敏 杜 鹏

主 编 杜 鹏

副 主 编 周 荣 孟繁颖

编 委 王大广 贾铁英 李 宏 颜 梅 楚艳红

蒋利华 谢天武 陈虹百 耿希继 武 洋

采 编 李宣谊 王 迪 刘 芳 尹晶涵 杨秋明

陈亚丹

技术支持 黄文盛 伍婷婷

| 序 言 | PREFACE

2018年，改革开放迎来了第40个春秋，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复校40周年的纪念，距离77、78级校友入学，也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。中国改革开放大幕徐徐拉开，77、78级校友自从与人大结缘开始，以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的精神，探求真知、博学笃志的求学态度，心系社会、报效家国的责任担当，书写下与改革共命运、与时代共发展的精彩人生故事。

40载时光荏苒，历尽沧桑。1978年7月7日，国务院批复了教育部《关于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》，诞生于抗战烽火、成长于革命征途的中国人民大学结束了短暂的驻足，重新迈开了奋进的步伐。此前不久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几百万考生，走进了高考考场。他们的经历注定不凡：虽曾历经苦难，却始终奋发向上，希望通过这场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1978年4月20日，1977级3个班240名同学走进人大校园；10月20日、21日，1978级22个班1077名同学入校，由此与中国人民大学结缘，同他们的母校一起，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获得了重生。

40载岁月如歌，见证芳华。77、78级学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。复校初期，办学条件虽艰苦，但他们求知的热情和飞扬的理想却并没有被阻挡。八百人大教室慷慨激昂的演讲、露天食堂的饭菜、一本本油印的教材……这方校园的一情一景，都成了他们最珍贵的记忆。他们激荡于古今中外的学说思想中，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，关注着社会的日新月异，与母校共同成长。

40载心怀感激，师恩深重。中国人民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后，曾散作漫天星火的人大教职员工，克服了种种困难重聚校园。面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新一批大学生，老师们感到的不仅是兴奋，还有重新搭建学科体系、立德树人的沉甸甸责任。大家以“时不

我待，只争朝夕”的紧迫感，全身心投入到教学、科研和日常管理任务之中，使复校后的中国人民大学，很快回归到了它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。教职员们的辛劳付出，让77、78级同学们终生难忘。

40载春风化雨，桃李芬芳。77、78级校友从人大启航，奔向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。从敢为人先、推动国家社会向前发展的政界精英，到筚路蓝缕、艰苦创业的商界翘楚，再到闻名遐迩、潜心治学的专家学者，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，努力奋斗，奉献着青春和智慧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77、78级校友不仅是时代变革的见证者，同时也是时代变革的参与者和推动者。他们持之以恒地践行着“实事求是”的校训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谱写新的华章。

40载砥砺前行，不断前行。中国人民大学复校4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校园面貌焕然一新，新校区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工建设，绘就出了“世界一流、北京最美、独具风格”的现代化示范校园蓝图；学校各项工作全面推进，一流学科发展和绩效评价体系制定完成，“双一流”建设稳步推进，科研工作取得新进展，人才培养工作在稳健中不断创新，人才队伍建设扎实推进，国际交流水平持续提升。这些成绩的取得，凝聚着包括77、78级校友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。

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《与改革开放同行——中国人民大学校友口述史（第一辑）》收录了40位77、78级校友的口述访谈，用文字还原了40位改革开放见证者的求学经历和奋斗故事，刻画了时代背景下一段段跌宕的人生轨迹，描绘了一个个鲜活的人大校友奋斗者的形象。尽管囿于种种条件，不能访谈所有校友，但相信本书记录的故事，可以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友群像增添一抹耀眼的亮色。

追寻改革足迹，聆听改革声音，塑心聚能，澎湃向前。在这个独具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，我们感受历史的厚重，也目睹了新时代的成就。重温历史，我们体会信仰的力量；阅读今天，我们见证斐然的发展成绩；畅想未来，我们对中国道路更加自信。

我们与77、78级校友共勉，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。我们共同回望改革之路的征途，温习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和国家共命运的光荣

传统，是为了在新时代找准自己的前进方向，继续扎根中国大地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。

我们与 77、78 级校友同行，“却顾所来径，苍苍横翠微。”复校 40 年起点上的中国人民大学年轻而充满朝气，在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，改革的步伐已走过千山万水，仍需披荆斩棘。年轻而充满朝气的中国人民大学，必须在伟大的时代中准备好承担自己的使命，不驰于空想、不骛于虚声，勇做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排头兵，勇做时代之问的答卷人，勇做民族复兴的筑梦者！

| 目 录 | CONTENTS

王丹彦	001
牛 军	025
尹韵公	037
田惠明	049
冯伯群	059
朱新会	071
刘国新	081
孙 钢	089
李 风	101
李泽忠	119
李振宁	127
李 黎	145
何砚平	157
汪大昭	169
汪建熙	181
汪 朗	195
张松涛	207
张宝瑞	217
陈小宪	229
陈 旭	245
陈志军	259
陈国青	271
陈湘安	283

苗 棣	297
周炳成	309
孟兴国	321
孟 杨	337
赵向阳	349
姜 波	359
顾晓阳	373
倪小庭	381
徐 建	395
郭凡生	407
郭嗣平	417
梅兴保	427
蒋志刚	439
傅绍万	451
解玺璋	467
廖明球	479
熊应进	491



王丹彦

| 人物简介 | 北京人

大众传播伦理学博士，二级高级编审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（正局级），全国百佳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。1978—198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。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主任、法制部主任、社教中心副主任，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副主任、主创作者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，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。十余次获中国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、全国人大新闻一等奖、全国“五个一”工程奖等。现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及中国传媒大学艺术部特聘教授。

人大给我的最深的印记就是：融化在血液里的使命感、责任感和家国情怀。在遇到问题时，不会以个人去站位，而总是会从国家的角度，从民族的角度来考虑。

◎ 学海泛舟久，十年人大情

我在北大出生，也在北大长大。父母都是离休干部，一路参加革命当兵过来筹建总参某部，所以我从小行事作风就有军人的感觉，没有女孩子娇滴滴的习气。因为北大于我太过熟悉，所以一心想想要换个环境，于是有了与人大的情缘。本科加上博士，人大记录了我将近10年的岁月痕迹，也影响了我的发展轨迹，打磨了我的观念秉性。

我小学转了三次学，都是红小兵副连长，到了中学，做班里的团支部书记，后来又做校团委副书记。但实际上我不会“当官”，我会干事儿，做事才走心。我在北京101中学做校团委副书记的时候，专管出学校宣传的最重要的两大块黑板报，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期。这个过程很锻炼人，每新出一期，黑板报前都会围满了人。那时候海淀区还有校团委书记的马列学习小组，我们都很活跃。我后来一心想学哲学，渊源也就在这。

上大学之前的工作，我其实有很多选择，例如去部委做秘书，我都没去。那时候，我一心想当产业工人，调研了各地插队的情况后，我觉得产业工人最先进。终于，有个纺织厂来校招工，于是我有了在北京市七一棉织厂的一段工作经历。刚进厂时，厂里看重我，想让我做团委副书记，而我一门心思要从底层干起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织布挡车工。那时的工作是早中晚三班倒，看管36台

织布机，一圈一圈地转，眼快手快是必需的。要时刻保持注意力，不能打盹，特别是夜里。因为打盹就有可能放过布料上的小疵点，而小疵点的处理必须在10厘米之内。过了10厘米，布料就不能拆开了，瑕疵也就没法补救，整批布将降为二等品。在处理手头的小疵点的时候，还要兼顾其他35台机器的情况，要协调好。当年，我创造了我们厂里第一个万米无次布，成为北京市“学大庆标兵”。那时候没有任何物质奖励，就是一车人敲锣打鼓到家里送大红花、送喜报。

这一段亲身经历，后来成了我笔下的答卷。1977年我参加高考，那一年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是《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》。我写了这一段经历，结果作文拿到了85分的好成绩。1978年人大复校，我如愿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新生。我一直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非常感兴趣，在我的理解中，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上的一个统领学科，所以我选择了哲学专业。和大部分同学不同，我当时的身份是工人，因此是带薪上学。

我对研究康德很有兴趣，而当时我们班同学大部分的研究方向都不是这个，于是，我经常去找陈志良和唐有伯两位研究生讨论问题。我们的讨论多半在吃饭的时间，地点是教职工食堂。我是本科生，本没有资格进教职工食堂，为了讨教问题，我就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一起讨论的话题很多，除了康德，还有很多相对高深的学术问题。他们读的书多，所以他们的视野自然比我们本科生更开阔、更专业。

那时国门刚刚打开，国外的很多英文资料涌入进来。我的英语在班里还可以，我翻译了《社会心理学》、康德的《未来形而上学导论》和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等书籍的节选章节。罗国杰老师也很信任我，让我帮他翻译一些原著作品，大约十万字。翻译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锻炼提高，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我就去请教高年级的学生，又是难得的学习机会。

这样跨年级的交流和对话，在努力中钻研、进步，这些经历让我受益良多。

回忆大学时光，除了学习，还有令我印象深刻的事，那就是每天早起跑步背单词。我那时是英语快班的课代表，出于鞭策督促自己的目的，我告诉自己必须得早起坚持背单词。早晨六点起床到操场。身体和头脑都运动，宿舍8个人一早就都出去了，那时候特别积极，风雨无阻。我还参加了学校武术队，早上跟大家一起站桩、压腿，然后下午4点多还有一段训练，每天两段训练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。这个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，竟然把我多年的鼻窦炎治好了。

工作多年后再与母校结缘，是在1996年。校友们告诉了我一个好消息：国家的新政策出台，参加工作的可以用同等学力直接读博。我本来工作很忙，天天加班。但是感念他们的好意，我觉得是种鼓励，也是种肯定。于是，在学友们的帮助下，也通过自身的努力，我顺利通过了五门加试，1998年，我又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入学读博。

我考虑再三，我认准了罗国杰老师令人折服的学养和为人，想着这就是我的人生导师，所以最终选择了跟随罗老师做传播伦理学方面的研究。罗老师思想很开放，也有一套自己的学术布局，我们这一批学生主要研究方向大都是应用伦理学。我们之前的工作经验成了博研经历中的一笔宝贵的“财富”。

我是全国大众传播伦理学的第一个博士。因为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相关的工作，话语体系已经养成了传播学的习惯，写出来的东西就不像伦理学的。那时，传播伦理学在国内没有任何引进的读物可以借鉴，经常写着写着我就自己推翻了，博士论文的写作就是不断推翻传播学逻辑关系，更改成伦理学模式的过程。所有的大小书店，所有的和应用伦理有关的书我全都买来，还有就是去国图复印相关资料，集中研究应用伦理学的话语体系。经此一段，我也明白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，必定是要在曲折中寻找方向，不断摔跤跌倒再不断爬起来向前。论文很“难产”，加上工作繁忙，整个论文的写作打磨耗费了很长时间。到最后，借着“非典”时期会议少，我在办公室住了3个月不回家，天天修改论文，天天熬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

最终我的论文成为人大伦理学的全优论文。而这也成了我长达5年的博士生涯的完美句号。

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，潜移默化地使我有了一种学术思考的习惯，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会有两套思维体系，一套是尽职尽责要做的事，另一套就从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是怎样的。在职期间，我先后结合工作完成了近20个业务调研报告和部级课题，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红旗文稿》《理论前沿》和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》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评论研究文章，先后主编出版了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》系列等20多部理论研究著作。我的新专著《电视艺术创新：思维重启》近期已送出版社，即将正式出版。

◎ 知识即力量，理论广传播

从踏上岗位到退休，我在广播电视界工作了几十年。然而我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。从哲学的高深转入广播电视的通俗，一切的最开始，都是机缘巧合。

本科毕业分配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一级单位，优先来到学校挑人。他们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，政治上、文笔上都得过硬。当时我在班里不是最能写的，却是最早发表文章的。我的学年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终极意向，发表在《自然辩证法报》上，后被选入《人大期刊复印资料》，再加上我的毕业论文也是优，于是我就被老师们推荐，选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。其实我自己当时也不怎么听广播，懵懵懂懂就一脚踏入了新的领域。

那个时候全社会都讲“知识就是力量”，大众媒体都非常重视理论。当时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理论编辑部这个部门，分为哲学、经济、法律3个组，我就进了哲学组。

到央广后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小文章叫《受众群》，我提出了“广播受众群”这个概念，不认识我的人读了几乎都以为我是老头儿，跟我说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，条理特别清晰，逻辑性很强。我

的文风就是这样的，这可能受益于我上学期间读译康德的英文原著，也受益于罗老师对我进行的翻译训练，对我的思维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。

刚去第一年，我找到人大哲学系的老师合作，做了“全国自学高考哲学问答”。我采访老师并执笔，之后老师再根据文稿帮我修改。这个哲学问答推出后备受好评，出版成书竟然卖了55万册。当时，理论编辑部根据社会热点举办各类广播讲座，例如：十三大党章修改的辅导讲座，就请修改党章的人来做广播讲座辅导，讲为什么要这么修改。如果农村改革是年度重点，我们就做中国农村改革当前的若干重要问题系列讲座；如果国企改革是年度重点，我们就做国企改革的问题；如果金融改革是年度重点，我们就做金融专题等等。之后印刷出版的书籍都十分火爆。而我出的书基本上列为每年理论编辑部的出书之“最”：推出书籍数量最多，销量也最高。比如《现代思维与改革漫谈》《现代领导观念漫谈》及《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对话》。值得一提的是我编的《严新气象现象》是唯一一本被香港出版社选中并买走版权的严新相关书籍。

当然，这份工作压力也不小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理论编辑部，当时在全国的权威性非常强。

著名的“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”，《光明日报》刊载文章当然是第一功臣，但在整个讨论的前后时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手配合推出了若干相关的内容，在全社会营造合力。从那时起，每一个理论编辑部的成员，都以传播高端但又关注现实的理论知识点和对现实解疑释惑为己任。强大的权威性意味着重大的责任感。工作过程中，大家都特别注意确保文化的原汁原味和理论的准确性。因为任何一个微小的常识性问题都可能被听众挑刺，那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节目的权威性也就会受到挑战。

在理论部的工作，为我的职业成长和学术成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，文史哲经法都触及。每做一个大专题，就可以和相应学科领域里顶级的学者对话交流，自然也就在这个专业里有了积淀。

我举一个例子。在很长时间里，中国出现了“一手软一手硬”

的问题，就是只抓物质文明，不抓精神文明。后来针对此问题，中央连发了两个精神文明决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全民掀起热潮，讨论社会公德、传统美德、职业道德等等话题。我策划了专题“传统道德大家谈”。“大家”有两个意义：一是从各方来的声音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讨论。二是专指名家、大家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。我当时采访了很多哲学界、史学界、文学界的泰斗，比如任继愈、季羨林、张岱年，邀请他们来谈中国传统道德是什么。有些地方把我们每期节目的内容都张贴出来，广为宣传。我们收到了好几麻袋的听众来信。后来这些内容结集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书籍叫作《传统与选择——中国传统道德大家谈》，出版后广受好评，大家都爱看。我后来还做过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专题节目——“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”。第一部宪法、第一部婚姻法、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……我们邀请所有参与过法律制定、撰写法律条文的前辈来口述历史，作为历史的见证记录。因为我并不是法学界的人，很多情况都不了解，联络采访的时候，得到了司法部、中央政法委、人大法工委、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方面的帮助。现在很多当时参与节目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这些录音也就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绝版，常常作为重要的音频素材出现在重大节庆的专题节目中。后来，根据这些录音内容，我整理出版了一本书，叫作《共和国法制建设50年》，我因此入选中宣部司法部“三五普法先进个人”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出了获表彰人员名单。

还有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我曾接受总理办公室的任务，撰写《答日本NHK记者问：如何看待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和中日关系未来》，要求我用5天交稿，我4天就交了上去。大领导批示：写得很好，可提供参阅。后来得知这项任务在我之前曾找了好几个人都没接下来，由此我得了“广电第一支笔”的绰号。

长期的工作积累，让我个人形成了一个中国顶级专家的联络资料库，这一点我非常自豪。简单说，全国范围内所有学科领域，无论需要找哪位专家，我马上就可以联络到。这主要与我在日常工作中的用心积累有关系。每做一个专题，联系采访的相关专家我都认